

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

——海外学者视角评析

闫 健◎著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Examining the Studies on CPC by Overseas China Specialists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项目 | 前沿问题系列 |

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

——海外学者视角评析

闫 健◎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海外学者视角评析/ 闫健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 - 7 - 5117 - 1783 - 2

I. ①中…

II. ①闫…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执政 - 研究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8429 号

中国共产党转型与中国的变迁:海外学者视角评析

出 版 人 刘明倩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王琳

责任印制 尹 璐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n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曾祖母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界定	5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11
第三节 写作框架	30
第二章 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一项学术史考察	32
第一节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起	32
第二节 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文献梳理	40
第三节 小结	73
第三章 党与市场	74
第一节 列宁主义政党：一个脆弱的政治组织	75
第二节 经济改革与转型中的中国共产党	86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	105
第四节 小结	117
第四章 党与国家	119
第一节 党与官僚体系	119
第二节 党与立法	133
第三节 党与司法	146

第四节 小结	168
第五章 党与社会	170
第一节 党与乡村社会	170
第二节 党与公民社会	194
第三节 党与社会稳定	211
第四节 小结	224
第六章 结语：控制、制衡与自我束缚	225
第一节 控制与制衡：一个理解海外学者中国共产党转型研究的 分析框架	227
第二节 控制、制衡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束缚”	247
参考文献	255
后 记	288

图表索引

图 1.1 《国外理论动态》杂志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成果引介状况 (1994—2010)	18
图 6.1 “乐观派”与“悲观派”的理论背景分歧	235
图 6.2 “乐观论”与“悲观论”分析工具图	236
图 6.3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同心圆结构	240
表 1.1 国内主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15
表 1.2 国内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机构	17
表 1.3 国内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主要刊物	17
表 2.1 主要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机构	35
表 2.2 主要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刊物	36
表 2.3 1960—1965 年间《中国季刊》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文章内容 统计	43
表 2.4 1966—1977 年间《中国季刊》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文章内容 分析	49

第一章 导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代表了中国人探索和追求现代化的又一次努力。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深刻变迁。经济上，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整体的国家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被称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则是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社会结构的重组以及文化的深刻转型。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急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体系的外部环境，进而对政治体系的改革提出了要求。从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来看，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表征无疑就是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启并推进了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型。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特殊路径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总体危机”使得“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然而，在传统秩序日渐衰微、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的情境下，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重任不得不落到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革命政党身上。无论是起初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都是奉行“以党建国”的革命政党，尽管在整合政治精英、动员社会力量以应对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方面，中国共产党远较国民党要成功得多。

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基本上没有离开“以党建国”的历史轨迹——这或许也是中国人在当时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唯一

切实可行的选择。反过来，“以党建国”的历史选择也必然会对后来的国家建设进程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伴随着“后革命时期”的到来，革命党自身的属性势必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后革命时期”的国家建设之中。具体而言，革命党具有以下显著属性：

首先，斗争性。革命党的首要目标是制造革命形势，暴力推翻现有政权。由于致力于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权更替，革命党的行为逻辑体现为一种“斗争哲学”——目标是暴力推翻现有政权，策略是在削弱对手实力的同时扩大自己的力量和支持基础，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其次，集权性。职业革命家构成革命党的权力核心，因此，革命党本质上是一个精英政党。生存环境的险恶以及革命形势的变化莫测，意味着革命党的权力必须集中于少数政治精英手中，以便获得统一的行动能力和政策灵活性。同时，这也意味着革命党必须构建起一整套内部的等级体系，以获取其成员的服从，避免因内部冲突而削弱组织力量。

再次，组织纪律性。如前所述，革命党是一个“斗争”组织，它的直接目标就是确保自身在激烈的暴力冲突中存活下来。这就要求革命党必须发展起严密的组织纪律，以确保成员的服从和统一的行动能力。与此同时，革命党的集权性特征也要求其成员必须服从组织纪律，以确保党的领导人始终具有指挥组织行动的权威和能力。

最后，动员性。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积极有效的组织动员。对于党的领袖而言，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组织成员是保持组织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关键途径。对于党组织而言，有效的动员意味着更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党的动员能力直接决定了革命的规模和推进速度。正因为动员对于革命的至关重要性，革命党一般都会发展出为本党所体认的意识形态，以提升民众对于本党主张的认同和向心力，进而提升革命党的动员效力和动员能力。

因此，革命党本质上就是“为革命而生”的政党，这表现在它的斗争目标、组织原则和行为方式都是出于赢得“革命”的需要。然而，另一方面，革命环境本身又是影响革命党自身属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斗争的

险恶环境和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使得革命党必须拥有斗争性、集权性、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及强大的动员能力，否则，革命便极有可能归于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自身又是革命环境造就的产物。

如是，则革命环境的变化抑或消失势必将对革命党维持自身的属性产生根本性影响。革命的胜利，意味着革命党原先立基于上的革命环境的消失以及后革命时期的开始，这就使得革命党保持其原有属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革命的胜利使得革命党失去了斗争的对手，这将不可避免地侵蚀革命党的“斗争性”；生存压力的缓解使得革命党很难像革命时期那样维持其组织纪律和意识形态纯洁性，反过来，这又使得它很难维持革命时期的动员能力；革命的胜利使得党内的权力集中失去了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何发展党内的民主选举和决策机制便成为革命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后革命时期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对革命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革命党在革命时期的首要目标是“夺取政权”的话，那么，随着后革命时期的到来，革命党的首要目标便应当转到“国家建设”上来，即为社会提供完善的政治法律架构、维护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以及提高广大公民的福利水平。然而，到了后革命时期，革命党赖以成功的诸多属性反而成为国家建设的障碍：革命党的斗争性与国家建设所要求的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格格不入；革命党的集权性使得合理的政治法律架构很难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社会成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革命党的组织纪律性和动员性恰恰抑制了这种自主性和创造性。

如是，则在后革命时期，革命党实际上同时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是如何保持自身的“革命”属性，二是如何继续承担起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更为严峻的是，这两种压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革命党“革命”属性的延续在维持其自身认同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束缚自身，使其无力继续承担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以应对后革命时期全然一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此，在后革命时期，革命党实际上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是为了维持其自身认同而“继续革命”，二是为了继续

承担国家建设重任而放弃其革命属性，进而转变为一个执政党。

新中国的历史便是这两种选择的一个缩影。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继续革命”的道路。这样一种选择，固然要放到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审视（冷战、苏联的影响等等），但其直接出发点却在于维持革命党自身的“革命属性”。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党的革命属性与后革命时期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甚至党的革命性本身就是推动后革命时期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这构成了党“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毛泽东时期，党致力于通过维持自身“革命属性”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尤其表现为政治集权、经济控制、意识形态灌输以及无休止的群众运动。由于革命环境的消失，党甚至不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来重新“制造”革命对象，“再造”革命环境，以维持自身的“革命属性”。然而，如前所述，革命党的“革命属性”与后革命时期的国家建设任务格格不入——新中国前30年国家建设进程屡遭破坏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便面临着第二种选择的压力，即从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这种转型的正式开始。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弱化乃至摒弃其“革命属性”，不断推进自身向执政党的转型进程。对于一个革命党而言，向执政党的转型意味着一系列艰难而深刻的自我调整。从政治目标看，革命党的政治目标在于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而执政党的政治目标则在于为社会提供完善的政治法律架构、维护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以及提高广大公民的福利水平；从行为方式看，革命党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社会动员等方式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执政党则主要通过法律渠道以及理性化的行政过程推行自己的政策；从权力的属性看，革命党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这不仅体现在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人手中，还体现为执政党不与其他政治和社会行为体分享权力。然而，由于国家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执政党必须在党内适当分散权力，以避免因个人决策失误而导致的惨痛政策后果。同时，为了培育社会内生发展的空间，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执政党还需要收缩自身的权力范围，同时赋予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一定的权

力空间。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围绕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而展开。一方面,这种转型过程本身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党内一些重要改革,例如党内最高权力平稳交接、任期制、干部人事制度、党内决策制度以及党内选举制度改革,成为各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又为其他领域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例如村民选举、公务员制度改革、政府信息公开以及社会组织兴起等,无一不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转型过程息息相关。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一个核心变量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变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型。

如是,若要加深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变迁的理解,则必须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研究。本书旨在梳理并评析海外学者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变迁的研究成果。此项研究致力于实现相互关联的两大目标:一是了解海外学者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变迁的基本观点与态度。例如,在海外学者看来,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整体的社会变迁又意味着什么?二是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和评析,同时探寻它们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意义。例如,在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背后是否存在着共同的理论预设?它们的合理性在哪里?又存在哪些不足?它们对于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又有哪些参考价值?围绕上述的两大目的和若干核心问题,本项研究旨在评析海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理解。

第一节 选题的界定

为何是“海外学者”?

此项研究将以“海外学者”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转型的相关研

究成果为主题。这里需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此项研究所指的“海外学者”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学者”，尽管二者无论如何都有着很大的重合。“西方”，无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形成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场景之下。这使得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冷战遗迹和意识形态色彩。相比较而言，“海外”概念不仅意识形态色彩更薄弱，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具体而言，此项研究所指的“海外学者”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学者”，同时也包括中国之外的“东方学者”以及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因此，“海外学者”的概念更能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全球学术共同体”日渐显现的现实。

其次，此项研究中的“海外学者”指的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并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传统汉学将中国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其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主要功用在于“理解”。相反，脱胎于传统汉学，“二战”之后在海外兴起的“当代中国研究”致力于使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分析当代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其主要功用在于“解释”。将“海外学者”界定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意味着此项研究将集中关注后者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变迁的研究成果。

再次，此项研究中的“海外学者”主要指的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中国问题研究者”。^① 尽管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但是仍旧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这既体现在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研究的中心位置，也体现在英语作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写作语言的主导地位上。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期刊大都是英文刊物，海外研究者所发表的专著也大多是用英语写成。尽管这种界定可能会导致对海外学者非英文研究成果的忽略，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它将充分囊括海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即便在那些非英语的国家中，以英语发表中国研究成果的趋势也很明显。例如，德国汉堡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中国事

① 出于研究的需要，笔者也将关注港台地区部分学者所发表的中文研究成果。

务》(*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的《国际中国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就是典型的例子。

关注“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一般而言,本土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研究本国问题的最佳观察者,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享有语言、文化以及研究资料等方面的“先天优势”。比较而言,外国学者对于他国的研究常常由于语言、文化和研究资料的劣势,而被认为是“隔岸观火”或“隔靴搔痒”,无法深入理解他国的历史文化场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批评都是事实。即便如此,笔者仍旧认为关注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如前所述,海外的当代中国研究植根于西方数个世纪以来的汉学传统,不仅积淀丰厚,而且业已形成自身风格,与中国本土的研究力量一并构成日渐显现的“中国研究全球学术共同体”。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海外学者在语言和研究资料方面的劣势地位已经得到极大改观,其研究成果的价值逐渐得到了包括中国本土研究者在内的学术界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利于我们完整地把握演变中的“中国图景”。对于研究者而言,“置身场景”固然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特定场景的自身逻辑,但这也容易导致研究者无法摆脱来自特定场景的潜在影响(在研究对象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环境下,更是如此)。换言之,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倾向不免为其所在的场景所塑造,由此导致研究者关注视域的狭隘以及研究倾向的偏差甚或扭曲。如是,则海外学者带来的“他者视角”无疑是对于中国本土学者相关研究的极大补充。

一方面,海外学者能够将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理论工具运用于中国研究之中,有助于中国研究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①另一方面,海外学者相对超脱的立场,有利于他们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②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东亚其他工业化国家以及“大中华地

① 按照郑永年先生的说法,“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见郑永年:《政治与社会译丛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研究,而是说,海外学者的比较研究由于其“他者视角”而能够成为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有力补充。

区”其他社会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一大特点。因此，无论是中国本土的研究者还是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都是“中国研究全球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他们拥有各自的研究优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事实上，随着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日渐深入，本土研究者和海外研究者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学者旅居海外，成为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力量。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与中国本土学者开展合作，有些甚至成为中国本土研究机构的兼职研究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外学者同中国本土学者都代表了当代解释“中国谜题”的学术努力，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争锋，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研究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走向。

此外，关注“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 also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执政者以开放的心态吸取一切有益的建议——无论这种建议是批判性的或是褒奖性的。在这方面，“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成果由于其独立性和多元性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舆论环境，将对于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许多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智囊机构，对于所在国的中国政策有着很强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参与了所在国中国政策的制定过程。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中国有关的公共舆论的塑造者，影响了所在国民众对于“中国形象”（China Image）的想象——这对于国际社会如何认知中国崛起十分重要。正如刘东教授在谈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时所言：“中国今后的道路无论顺与不顺，都肯定要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影响，而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又肯定要受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关键性影响。缘此，中国如不能在这方面具备相应的专门家，就很难具有专业水准地追踪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及其变化，就很难想清别人究竟为何对我们采取那

样的态度。”^① 因此，无论出于推进改革开放或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现实考虑，我们都必须认真研究海外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

为何是“中国共产党”？

此项研究将集中关注海外学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转型的研究成果。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演进脉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有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和领导核心，这使得它从一开始便成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关注焦点。无论是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对于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和“文革”的研究，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改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因此，集中关注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演进脉络，进而明确其连续性和发展趋向。

其次，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政治的总体判断。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变迁的核心变量，如要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则必须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为其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有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和领导核心，它的变化将直接对中国的政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中国多元社会与一元政治矛盾关系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学者面临的“中国谜题”的核心内容。用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的话说，“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② 在一定程度上，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反映了其对中国整体政治体系的分析，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轨迹的判断体现了其对中国整体政治体系发展轨迹的判断。

再次，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理论构建努力。

① 刘东：《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载《开放时代》2004 年第 6 期。

②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0, p. 18.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多元社会与一元政治矛盾关系的中心，是海外学者面临的“中国谜题”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海外学者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同国家机构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中国共产党是否仍旧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化努力说明了什么？多元社会与一元政治并存的状况，究竟源自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控制力，或是中国社会力量的匮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然而，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很难对这些问题给出充分的理论阐释，这就意味着海外学者必须进行理论解构与重构。正如郑永年指出的，“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①近些年来，海外学者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市场列宁主义”、“协商式列宁主义”以及“党国民主”等解释框架代表了其理论建构的努力。

为何是“改革开放之后”？

此项研究的时间跨度界定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代表了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又一次努力，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现代化力量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决定中国整体的国家走向，因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整个世界，改革开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标志着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为海外学者提供了深入中国社会的机会，从而改变了他们长期以来只能“远观”中国的状况。新的研究机会和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极大地影响了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使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若干特点。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引发的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本身已经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主要兴趣点。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引发的中国多元社会与一元政治并存的状况成为海外学者“中国谜题”的核心。正如罗德明（Lowell Dittmer）所言，“虽然解放后的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是研究的对象，但‘改革中的中国’——即从1978年12月

^① 郑永年：《政治与社会译丛序》，见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